

# “三苏”军事思想异同论

申 东 城

(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4)

**摘 要** 苏轼在府兵制度、选将方法、边防思想、及用兵主张上,对苏洵多有继承。苏轼在削减禁兵、加强士兵,十年兵制,全民懂兵,内设特职,外攘辽夏等方面,对苏洵军事思想多有转变,而苏辙在削减禁兵、重用士兵,放弃兰州,守卫熙州河州等方面,与其父苏洵、其兄苏轼有同有异。造成“三苏”军事思想承变发展的主因为:家学衣钵的传承,社会背景的不同,经历地位的差别,性格思想的多样。

**关键词** “三苏”军事思想 承变

**中图分类号** :I206      **文献标识码** :A      **文章编号** :1009-8666(2011)06-0012-06

北宋,自开国以来就存在“内忧外患”、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,面对这种国家危难的严峻形势,许多的军事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等,为了解救国家的危机,排除民族之患,挽救一旦之忧,而努力攻读兵书战策,深究历代兵法,揭发宋代的军事弊端。同时,北宋的当权者也提倡兵学,比如熙宁五年五月,神宗下令设立武学,对军事教育的一系列问题,都做了命令规定,元丰四年,神宗下令国子监组织人力,精选、校理古代兵书战策。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,宋代的人们非常喜欢言兵,“三苏”<sup>①</sup>亦然。

## 一、苏轼对苏洵军事思想的继承

### (一)府兵制度的继承

苏洵意识到了北宋军制上存在的问题,但他并没有直接对北宋朝的役法发表意见。但是,从他对军制看法表明,他是府兵制的支持者。所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<sup>②</sup>的基础上,受田者承担兵役的制度。府兵制下的军人,就是均田制下的农民,兵农合一,寓兵于农。

苏洵认为亦兵亦农是最理想的兵役制度,“三时纵之,一时集之,手指器械,教之战法,而择其精良者为长,在野督其耕,在阵督其战,则其人皆良农也,皆精兵也。”<sup>[1]69</sup>

苏洵关于兵制的看法早于苏轼,苏轼继承了其父思想,认为三代衰亡,井田制废除后,兵农分离,士兵不能在无事时成为平民,平民也不能停止劳作而供养军队,其延续了一千多年,到汉代,有轮戍的士兵,没有营田的军队。若遇战事,农民一旦参军,就不再承担农夫的义务。边境发生战事,征调各郡国军队,等到战事结束,军队就分散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故郡县没有常设的军队,京师也仅有南北军、期门军、羽林军。汉代士兵虽不从事农业,但其不能聚集在一起,故汉代并未受到这种军制的弊端影响,唐代设置了十六卫府兵,囤积在关中的府兵有五百多处,占天下的府兵八百处的62.5%。但是他们全都耕种田地积累粮食,既养活了自己,也增加了官府的储备,故天下安然无恙。

苏轼认为如今军队不事耕作,聚集京畿,全靠官府供养,这不仅造成赋税的厚重,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,而且给政府树立了不良的群众形象。他提出:“今欲尽易天下之骄卒,以为府兵”<sup>[1]300</sup>。以北宋现实状况来说,他认为亦兵亦农,既能提高战斗力,又能节省一大笔的军费。“及至后世,兵民既分,兵不得复为民,于是始有老弱之卒”,终生为兵,生死也不得退伍,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老弱病残不能作战的士兵。养着一群老弱病残的军士,这样一来军队里的开支剧增,战斗力也不强。

收稿日期 2011-05-03

作者简介:申东城(1972-)男,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,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,文学博士。

民成为兵后，“其妻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中，其姓名不得为农，而仰食于官。至于衰老而无归，其道诚不可以弃去，是故无用之足，虽薄其资粮，而皆廪之终身。”<sup>[2]367</sup>即使伤残老弱不能行军打仗，但也仍旧是军籍，一人当兵全家领俸禄。苏轼认为养着这样的士兵只是浪费国家的财产，况且让年老体衰的士兵去打仗是让他们去送死，“秦汉之后，天下何其惨败之多耶。其弊皆起于分兵而为兵，兵不得体，是老弱不堪之足拱手而就戮。”<sup>[2]368</sup>不过，苏轼对兵制的看法也有变化的过程，他早年赞成府兵制，后来渐渐看到府兵制的弊端，转而又赞成募兵制了。

## （二）选将方法的继承

苏轼、苏洵皆认为如何选举将帅，对于军队的建设是很重要的。

苏洵在《上皇帝书》中提出恢复文武皆要考的方法来选举，他认为如若只考武举不过是“挽强引重”，而“以策试之”也是记录章句，这也不过是无用之学。“臣愚以为可复武举，而为之新制，以革其旧弊，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，其以弓马得者，不过挽强引重，市井之粗才，而以策试中者，亦皆记录章句，区区无用之学。”<sup>[3]50</sup>所以他以为要文武并重。既要考文又要考武，“才文有制科，武有武举，陛下欲得将相，于此乎取之，十人之中，岂无一二？斯亦足以经矣。”<sup>[3]51</sup>

苏洵还提出，选的将士不宜太多，并且还要委以重任。让那些有才之士觉得碰到了“伯乐”，自己的才华得以肯定，这样豪杰之士才愿意为朝廷效犬马之劳，“又其取人太多，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；而待之又甚轻，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。故其所得贪污无行之徒，豪杰之士耻不忍就。宜因贡士之岁，使两制各得其所闻，有司试其可者，而陛下亲策之，权略之处，便于弓马，可以出入险阻，勇而有谋者，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，试以守边之仁。”<sup>[3]51</sup>通过这样的措施，统治者不怕没有人才，不怕朝中没有将相之才。

苏轼也认为北宋的军队之所以柔弱不振，是因为没有真正可用的人才，“然所以弱而不振，则是无材用也”<sup>[4]365</sup>，究其原因求才的方法不当。苏轼继承了父亲苏洵的想法，认为要有武科和文科。

但是苏轼又提出，仅仅这样的考察是不够说明他们是否真的有才能，将领最终是要训练士兵、带领士兵冲锋陷阵，所以还得考察他们的治兵的谋略，不能仅仅是纸上谈兵。苏轼在父亲的选将方法又有所发展，苏轼在选将上更讲究实用原则，直接让参考人员带新兵来考察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，“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，莫若治兵之不可欺也，今夫新募之兵，骄傲而难令，勇悍而不知战，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。武举、方略之类以来之，新兵以试之。观其颜色和易，则足以见其气，约

束坚明，则足以见其威，坐作进退，各得其所，则足以见其能。”<sup>[4]366</sup>

## （三）边防思想的继承

“三苏”父子对于北宋面临的“内忧”和“外患”，究竟谁才是北宋的根本祸根也提出了看法。

苏洵说“中国内也，四夷外也。忧在内者，本也，忧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无内忧，必有外惧。本既固矣，盍释其末以息肩乎？曰末也。古者夷地忧在外，今者夷敌忧在内。”<sup>[5]120</sup>为了每年给辽和西夏赠礼，北宋王朝只有增加民众的税收，使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贫苦，虽然这样名义上“息民”，是“外忧”，实则不然，是“忧在内也”。

苏轼也说过“盖自近岁，始柄用二三大臣，而天下皆信心涤虑，以听朝廷之所为。然而数年之间，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，此其故何也？而虏之大忧未去，而天下之治，终不可为也。”<sup>[6]323</sup>两人一致认为“外患”是北宋国弱的原因，“外患”才是真正的祸根，他们都认为“安内必须先攘外”。

苏洵认为辽国人只是“驰一介入中国，以形凌之，以势邀之，岁的金钱数十百万”<sup>[5]65</sup>，这样数十年之久，辽国就会增加数百千万的钱财，把辽的军队建设的兵强马壮的。而北宋就会日益贫困下去，如此下去，辽国就会有有机可趁。苏洵认为给了钱财也不会得到永久的和平，相反是养虎为患，“勿赂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。畏其疾也，不若畏其大，乐其迟也，不若乐其小”。<sup>[5]52</sup>祸患一直存在着，发生战争是迟早的事情，大宋朝每年给的礼币是给自己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。苏洵认为不能一直对辽国卑颜屈膝的，相反北宋应该态度强硬，断然不可再赂辽了。一旦辽国问起为何不送礼币时，北宋则可对曰：“尔等何功于吾？岁与吾赂，吾又占而已，赂不可得也。”<sup>[5]52</sup>

苏洵在《审敌》篇里分析了他认为辽入侵的真正目的，他认为“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，然今十年间，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。何也？非畏吾也，其志不止犯边也。”<sup>[5]53</sup>他举例说明了，如果匈奴真的想和大宋王朝交战的话，陕西发生元昊之叛、河朔发生王则之变、岭南出现智高之乱，这些都给了辽可趁之机，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开战，这就说明了匈奴人最起码近一段时间的志向不在战。他们的虚张声势不过想得到丰厚的物质，来达到养精蓄锐的目的，所以不必担心辽国的那些小动作。

苏轼赞同其父不可赂辽的观点。苏轼认为赂辽是“弃有限之财，而塞无厌之心”<sup>[7]319</sup>。每年为给“二虏”礼币，加重了老百姓的税收，老百姓交了税也不能保证丝毫不受到“二虏”的干扰。既要挨打，还得交费，实没必要。“盖古之为国者，不患有所费，而患费之无名，不患费之无名，而患事之不立，今一岁而费千万。是千万而已，事之不立，四海且不可保，而奚千万之足云哉。”二

虏有时“不折一矢，不遗一镞，走一介之使”就可以得到数以万计的金银财物，而“吾君吾相终日惶惶焉接之不暇”<sup>[6]323</sup>，生怕辽国一不高兴就大军南下。既然赔“二虏”始终解决不了北宋外患的危机，那就只有迎战。

#### (四)用兵主张的继承

苏洵在《权书》之《法制》篇中云：“将战，必审知其将之贤愚。与贤将战则持之，与愚将战则乘之。持之，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；来之，则一举而夺其气。”善于同敌人相持，就可以有机会窥测到敌人将师的疏漏，然后运用智谋而战胜他。而同敌人相持的办法，就是把军队分为几个部分轮流进攻。

苏洵早年在《心术》中提出要倡导士兵勇敢，“凡兵上义，不义，虽利勿动。非一动之为害。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义可以怒士，以义怒，可以百战”<sup>[8]128</sup>。他认为，善于指挥军队的将帅，要能使自己的士兵打起仗来没有顾忌，觉得有恃无恐。没有顾忌，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，有恃无恐，就会坚信一定不会战败。苏洵说，古时候善于治军的人，虽然用处罚的方法使士兵效命、用赏赐的方法使士兵效命、用激发起对敌人愤怒的方法使士兵效命，但其中一定都灌注着正义的原则，不是要用他们去发动战争，也不是要用他们去进行掠夺，而是要用他们应付国家的危难（《用兵》）。故以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帅，要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；如果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。那么这支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苏轼也提出要“倡勇敢”，作战以勇猛为主，以气势为决定胜负的关键。他指出要使人勇敢的方法，首先要激励他们，并满足他们的私欲。激励就是要利用人的一时兴起，勃然大怒，迷失本性，失去理智，来不及产生畏惧和后悔之心时候而驱使他们。一鼓作气的打垮敌军，“臣闻战以勇为主，以气为决。”<sup>[9]2100</sup>要士兵做到勇敢就要从满足士兵的私欲入手，“致勇莫乎倡，倡莫乎私”<sup>[9]2101</sup>。满足他们的私欲，就是平常要注意奖拔人才，私下里给他们好处。具体说，可以使人无功而受到赏赐，或有罪而得到赦免，使其产生愧疚之心，而使之身先士卒。西夏反叛就是一例，天子无为已分担忧愁的大臣，将军无心腹之士，故天子虽出兵，而将士争先败逃，朝廷只得重金求和。

## 二、苏轼、苏辙兄弟对苏洵军事思想的新变

### (一)苏轼军事思想的新变

#### 1. 削减禁兵，加强士兵

禁军的开销在每年的政府开支中占重头，苏轼曾说：“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。晏

然无事，而复敛之厚，至于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。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”<sup>[10]361</sup>苏轼认为养着这么多的禁军是劳民伤财。禁军多不劳而获，他强烈要求削减禁军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。相反要加强地方的武装力量，“夫士兵日以多，禁军日以少，天子护从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，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费之省者又过半已”。<sup>[11]296</sup>

禁军“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百倍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异于数十万之兵而一征也。农夫之力，安得不竭？馈运之卒，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，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上，然皆不得为休息，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天子出戌也”<sup>[10]362</sup>，禁军三年一换，换一次的开支好比一次大型的战争，但是却对北宋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变，相反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并且为维护地方稳定而设立的禁军也太多，他们的三年一次的频繁调防，不仅扰乱了社会稳定，而且费用太大，扰民太甚。

苏轼在《策别厚货财二》制定军制中认为，北宋已建国很多年，人心已定，没必要养着那么多的禁军来防着自己的臣民，“天下一家，且数百年。民之戴君，至于海隅，无以异于畿用，亦不必举以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军”<sup>[10]363</sup>。朝廷不必怀疑地方军队，而只相信禁军。应渐减少禁兵，多训练士兵，提高士兵待遇，以减少军费开支。

#### 2. 十年兵制，全民懂兵

与他的父亲不同的是，苏轼不仅仅看到了募兵制的弊端，要求革新兵制，改用府兵，他认为要提高战斗力还得从年龄上着手，因此他提出了十年兵制的具体主张，认为50岁以上士兵可转业为民。在30岁以下的平民选兵，限其服役期为10年，之后消除其军籍。这对国家和士兵皆有好处。苏轼认为：“五十以上，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一三十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，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。”<sup>[12]369</sup>这样平民三十当兵，服役十年之后回家，他的精力还可以养生死，为终身之计，“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老送死。”<sup>[12]369</sup>这样一来既节约了军费开支，又让年老伤残的士兵得以安享天年，免去了生活的后顾之忧，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
苏轼指出若能让民众交替当兵，士兵也能恢复平民，天下懂兵会打仗的人就多了，这样盗贼和戎狄就会有所顾忌，大宋朝廷就会安然无恙了，并认为不仅要让士兵懂得作战要领和一些军事理论，而且还应该向老百姓们普及军事知识，使他们不至于在真的战事中感到恐慌“秋冬之隙，致民田猎以讲武，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，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，使其心志安



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。”<sup>[13]355</sup> 苏轼提倡的是人人都尽可能的懂兵法,这一点上苏轼似乎与他的父亲有了分歧,苏洵觉得“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。”<sup>[3]355</sup>

### 3. 内设特职,外攘辽、夏

《策断一》<sup>[14]2105-2107</sup> 中,苏轼认为,对待辽和西夏问题,宋朝廷应该特设一个官位,使其专门承担应付外交的责任。这不仅有利于解放国内其他部门,使其能更专注于治理本国内事务,而且能预防国内民众的起义威胁,使国内不安分的民众,不能趁外国扰乱的时机造反。

对于“边境已安,而兵不得撤”<sup>[15]382</sup>,苏轼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,苏轼说:“其边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地,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。屯田之兵稍益,则向之戍足可以稍减。使数岁之后,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,然后数出兵以苦之,要使之厌战而不能支,而折而归吾矣。”这样,“北狄始有可治之渐,中国始有息肩之所”。<sup>[15]384</sup>

对于西夏和辽国,苏轼认为北宋朝廷应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。

《策断二》认为,用兵要有长远的战略计划。认为战争的指向,应该先针对西夏。如何对付西夏。小国的优势是,注意君臣关系的融洽亲密,使民众能够为国苦战而至死不去。大国的优势是,长于出击(运用孙子兵法理论说理)能够分兵。对付西夏,可采用多次出击,进一步说可兵分多路,也即让军队轮番休息和出征,从而做到我方能分,而敌方不能分,使敌人无法应付而最终失败。

苏轼说,西戎之患小,北胡之患大。故二者皆所以为忧,而臣以为兵之所加,宜先于西。又“取先易后难的方法,先对西夏宣战。在与西夏作战的时候要令军队轮番休息和出征,这是因为“夫大有所短,小有所长。地广而备多,备多而分力”<sup>[16]374</sup>。

《策断三》指出,论契丹形势。中国以法律完善取胜,匈奴以没有法律取胜。对于契丹,苏轼认为有三处可乘之机:离间法,幽州燕山、云中各郡民众对大宋朝廷的向心力和归宿感,利用宋朝有利的地形、国力和气势。

对于辽国,苏轼认为要靠智取,不可硬拼,毕竟辽国的实力也不弱。苏轼分析了辽国认为北宋有三处可趁之机,首先,可以从辽国内部开始,挑拨辽国的君臣关系。“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,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,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,而诟辱及于公卿,鞭扑行下殿陛。贵为将相,而不免囚徒之耻,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,特未有路耳。凡比皆可以致其心,虽不为吾用,亦以间疏其君臣”。对付西夏的时候,北宋擒了西夏的鬼章,苏轼就力荐通过鬼章对西夏用间。其次,“守

以行,”依靠我们险要的地势来击退敌人。最后,“其战以气”<sup>[16]377</sup>,苏轼认为武力可以暂居弱势,但是志气不可以丧失,所以必须要战。

苏轼《策断一》认为,用兵要掌握主动权,方可取得胜利。举出历史和宋朝当时战争实例,归纳出掌握主动权的方法,就是先发动战争,威慑对方,表示好战姿态,然后罢兵。

比起父亲苏洵来说,苏轼更是一个实干家,他不仅提出了理论,更亲自把理论付诸于实践。苏辙在《忘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就提到:“八年,以二学士制定州。定久不治,军政尤弛,卫武卒养懒不教,军卒蚕食其林赐,故不敢呵问。公取其贪污甚者,配隶远恶,然后缮修营房,禁止饮博。军中衣食稍足,乃部勒以战法,众皆畏状”。<sup>[17]222</sup>

苏轼在《策别训兵旅一》<sup>[18]2092</sup> 中,还具体提出了训练军队的三条措施,其一是“定军制”。讲了朝廷应该怎样积蓄人才。从反面论述,如今军队之所以柔弱,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人才可用。举例契丹和西夏威胁大宋,原因有三:无所畏惧,大宋朝廷态度不明朗,大臣不敢表态,官吏和士兵气势低下。从正面论述,求才的正确方法是,先确定名位,然后给其实利。选拔需通过三途径初步实现,熟读兵书,喜好论兵,设置武举。更应该看实际才能,视其如何治理、训练军队。也即通过武举和考察技艺、测试谋略的方法选择人才,用训练新兵的手段来检验其才干,给其名位,才是选贤正道。这还是从军事理论与练兵实际相连的角度而谈。

### (二) 苏辙军事思想的新变

#### 1. 削减禁军,重用土兵

与父亲苏洵不同,而与兄苏轼一样,苏辙认为要重用土兵,削减禁军,改革宋朝用禁军戍边的体制。他说:“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,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内郡之禁旅。其名愈高,其廩愈厚,其材愈薄。往者西边用兵,禁军不堪其役,死者不可胜计。羌人每出,闻多禁军,辄举手相贺;闻多土兵,辄相戒不敢轻犯。以实较之:土兵一人,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;禁军一人,其廩给足以贍土兵三人。使禁军万人在边,其用不能当三千人,而常耗三万人之畜。”<sup>[19]</sup>禁军既无战斗力,又耗费开支,所以应该停止禁军戍边的做法,大力发展地方防务,不出十年,宋朝的冗兵积弊可望消除。

#### 2. 放弃兰州,守卫熙(州)、河(州)

元祐元年(1086),苏辙上《论兰州等地状》,直接阐述他对西夏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。在这篇奏状里,他从“时之可否、理之曲直、算之多寡”三个方面进行分析,阐述兰州“可弃不可守”的主要理由,一是新主即位,恩信未立,“安靖则有余,举动则不足,利在绥抚,不利征伐”。二是兰州本为西夏地,先帝(神宗)时边将掠

得之,夺地不还,其屈在我。三是兰州乃“界外无用之地”,不值得费兵费粮去守卫,何况此地一日不弃,西夏侵扰一日不息,实乃边境不得安宁的根源。苏辙主张,放弃兰州之后,要加强边防守备,随时做好应敌准备,防止敌人新的进犯。“臣愿朝廷决计弃此(兰州),然后慎择名将,以守熙、河。厚养属国,多置弓箭手。于熙、兰往还要路,为一大城,度可屯二三千人,以塞其人寇之道。于秦、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,以为熙、河缓急救应之备。明救将佐,缮完守备,常若寇至。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至,庶几可以无后患也。”<sup>[20]</sup>关于兰州问题,苏辙后来在《再论兰州等地状》、《论西边警备状》、《论西事状》、《乞罢熙河修质孤、胜如等寨札子》、《再论熙河边事札子》、《三论熙河边事札子》、《四论熙河边事札子》、《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》、《论所言不行札子》等奏章中反复论列,从不同侧面阐述他关于处理与西夏在边境问题上的见解,成为苏辙元祐时期讨论边备策略最集中的文字。

综合观之,苏辙的外事观点大致有下列诸点:

第一,导致吐蕃、西夏合谋寇边的起因在宋朝。第二,不宜侵夺夏人良田兴修边寨。苏辙在《乞罢熙河修质孤、胜如等寨札子》中说:“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、胜如二堡,侵夺夏人御庄良田。又于兰州以北过二十里议筑堡寨,以广斥候。夏人因此猜贰,不受约束。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,不言可见矣。徒以岁赐至厚,和市至优,是以免修臣节,其实非德我也。使之稍有便利,岂肯帖然不作过哉?何者,中国既失大信,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。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,弃捐金帛,割裂疆土,一无所爱者,累年于兹矣。而熙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,徽求尺寸之利,妄凯功赏,以害国事,深可疾也。”<sup>[21]</sup>第三,朝廷对西夏的政策宽严失度,坐失良机。《再论熙河边事札子》、《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》集中阐述了苏辙对朝廷处理西夏事务失度之处。

要之,苏辙侧重分析宋朝在与西夏交往关系中应负的责任,导致两国关系紧张,宋方负有主要责任。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,他的边防策略是以退守为主的。

与苏辙一样,苏轼在元祐二年边将擒获鬼章时上《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》,也认为朝廷在处理阿里骨问题上的失当,是导致西羌、西夏解仇结欢、共兴边衅的直接原因。但他非常赞赏神宗对西夏连年用兵,使夏人困弊不堪,应付不暇,不得不求和。但由于敌人从中悟出了朝廷“厌兵欲和”之意,所以屡有请求,一不如意,便以寇边相协,使战与和的主动权掌握在了敌人手中。故苏轼建议朝廷:“若夏人款塞,当受其词而却其使,然后明救边臣,以夏人受恩不费,无故犯顺,今虽款塞,反复难保,若实改心向化,当且与边臣商议,苟词意未甚屈服,约束未甚坚明,则且却之,以示吾虽不逆

其善意,亦不汲汲求和也。”即令叛叛,只要我方“兵练士饱,斥候精明,虏无大获,不过数年,必自折困,今虽小劳,后必坚定。”

在对待战与和的问题上,显然苏轼比苏辙的态度更强硬,虽然最终都是为了求和,但策略上需要应用古代兵法上的战略战术。

苏轼在《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》中提出“以夷狄攻夷狄”的战略建议,并派遣辩士到敌国去,“离其腹心,坏其羽翼”<sup>[22]</sup>,这与其父苏洵《权书》之《用间第五》赞成使用间谍法一脉相承。苏轼在文中强调的仍然是主动出击、先发制人,这又迥异于其弟苏辙被动退守的军事观点。

### 三、“三苏”军事思想异同的原因

#### (一)家学衣钵的传承

作为北宋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,父亲苏洵大器晚成,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,精通百家之说。苏洵对自己的治国之才也相当自信,他曾说过:“洵著书无他长,及言兵事,论古今形势,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,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,苟深晓其意,施之于今,无所不可。”<sup>[23]</sup><sup>[105]</sup>仁宗嘉祐元年(1056),苏洵带领苏轼、苏辙到汴京,谒翰林学士欧阳修。欧阳修很赞赏他的《权书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几策》等关于北宋军制的文章,认为可与贾谊、刘向相媲美,于是向朝廷推荐,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颂。

苏洵擅长论兵,对苏轼、苏辙兄弟影响颇大。苏轼曾说:“少与辙皆师先君,初好贾谊、陆贽书,论古今之乱,不为言空”,<sup>[172]</sup>苏辙在他的《坟院记》中提到自己和苏轼是继承了父亲的志愿,“吾(苏洵)尝有志兹世,今老矣,二子其尚成吾志乎!”<sup>[24]</sup><sup>[80]</sup>

#### (二)社会背景的差异

宋初,存在很多军事弊端。苏洵(1009—1066),生活在北宋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,其军事思想可以视为呼吁当时社会变革的投影。苏洵的论兵《权书》等,能被士大夫争相传诵,名动京师,可见其许多观点是深入人心的。

苏轼(1037—1101)比其父小27岁,苏辙(1039—1112)比其父小29岁,苏氏兄弟出仕为官时,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,社会矛盾、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激化,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呼吁。嘉祐六年后,苏氏兄弟开始针对冗兵、冗官、冗军、冗政、财乏等方面,写出大量策论,大声呼吁要求改革,尤其军事方面,提出了各自非常有特色的观点。神宗年间,苏辙更写了大量军事文章,为大宋朝廷的边防、军队等献言献策。时代的变迁,他们的军事思想较之父亲苏洵,无论在思想和内容上都起了新变,突出的是,苏轼兄弟的军事论文,更多的是贴

近现实社会状况，尤其对当时日益突出的辽和西夏问题，提出了很多颇具特色的观点。

(三)经历地位的不同

苏洵一生三次参加科考而不中，“知取仕之难，遂决意于功名，而自托于学术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。直到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苏洵 53 岁时，方被任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而苏洵在治平三年（1066）58 岁便去世。苏洵大半生皆为布衣，其写的军事文章几乎皆是出仕前完成，这与苏轼、苏辙兄弟的早早为官大有区别，也决定了他们看待军事的观点和视角有所不同。

苏氏兄弟的个人经历也是不同的，苏轼一生坎坷，政治生活几经沉浮，晚年一贬再贬，政治党派的斗争影响了他一生。苏辙官场较为稳定，晚年官位较高，这都决定了二人军事思想的不同，比如苏轼的主张主动出击，争夺战争的主动权，而苏辙主张退守、弃兰州等。

(四)性格思想的使然

与经历地位密切关联的，是“三苏”性格思想有别，也是其军事思想不同的原因之一。苏洵年轻时候常游荡不学，“年二十七始大发愤（读书）”，故其军事论文，常立足于现实，着眼于实用。常自谓“洵著书无他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”<sup>[25]</sup>苏洵好谈权变法术，《权书》前五篇阐述统兵应敌的策略原则，后五篇借论孙武、子贡、六国、项籍、高祖等历史人物与事件，品论用兵得失，是在古代兵书遗产基础上写成的军事著作。这皆与其布衣时流荡性格多有关系。

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，其满肚子不合时宜，加上经历坎坷，政敌较多，故其军事文章更加犀利多讽，更多的是与众不同，并独树一格。更重要的是，苏轼长期受贬，生活在一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里，与其父苏洵经历多有神似，这也导致其军事思想更见激切和棱角，而与弟苏辙一生较平静富足生活，和较稳重性格，及其形成的军事思想，产生很大反差。

注释：

- ①“三苏”是对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的常用简称。
- ②均田制是指封建王朝对国有土地实行按农户人口“计口授田”的制度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苏洵. 兵制[M]//苏洵文集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2]苏轼. 策别训兵旅二[M]//苏轼文集:一一二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3]苏洵. 上皇帝书[M]//苏洵文集:卷三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4]苏轼. 策别训兵旅一[M]//苏轼文集:一一二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5]苏洵. 审敌[M]//苏洵文集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6]苏轼. 策略二[M]//苏轼文集:卷一零九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7]苏轼.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[M]//苏轼文集:四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8]苏洵. 心术[M]//苏洵文集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9]苏轼. 策别训兵旅三[M]//苏东坡全集:卷三十八.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9.

[10]苏轼. 策别厚财货二[M]//苏轼文集:卷一〇九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1]苏轼. 定军制[M]//苏轼文集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2]苏轼. 策别训兵旅二[M]//苏轼文集:卷一一二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3]苏轼. 策别安万民[M]//苏轼文集. 北高丽买书厉害一[M]//苏轼文集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4]苏轼. 策断一[M]//苏东坡全集:卷三十九.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9.

[15]苏轼. 御试制科举策[M]//苏轼文集:卷一一二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6]苏轼. 策断[M]//苏轼文集:一〇九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7]苏辙.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[M]//苏辙集:卷七二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18]苏轼. 策别训兵旅一[M]//苏东坡全集. 卷三十八.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9.

[19]苏辙. 栾城集. 卷二十一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
[20]苏辙. 栾城集. 卷三十九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
[21]苏辙. 栾城集. 卷四十三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
[22]苏轼. 苏轼文集. 卷二十八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6.

[23]苏洵. 上韩枢秘书[M]//三苏全集.辽宁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

[24]苏辙. 坟院记[M]//苏辙文集:卷八四. 北京:北京语文出版社, 2001.

[25]欧阳修. 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[M]//欧阳文忠公集. 四部丛刊本.